



# 谁最应该为纸币的诞生而欢呼

文 / 北极豪客

## 人类史上第一张纸币在四川诞生

有人要问了,宋朝的货币怎么那么乱哪?一个典型的文官政府,怎么连货币都管理不好?

别急,听我慢慢说。

上面说了,北宋的商业空前发达,总结起来,优点就太多了——

商品构成丰富(看得人直流涎水)、商业分布合理(开店不再受地点限制)、商业分工精细(卖什么的都有)、商业管理水平提升(雇工少的10多人,多的有40余人)、配套商业形成(吃了饭可以到院街洗脚)、行会组织发达。这一切,都意味着营业额的提高。营业额体现的就是资本运作,就是钱在滚动。宋朝商业的这种大好形势,自然就对货币提出了更高要求。要求它的数量更多、制度更完善、信誉更权威。

可是宋朝在这方面先天不足。

在它以前,唐朝钱绢并行、金银货币

兼用,五代是铜铁钱兼用,这都是由于铸币的铜料不足而采取的应对办法。

宋代的商业更精密了,像唐代那样的货币制度就行不通了——买一包酱肘子,谁还能用绢啊?可是宋朝又没有能力建立统一的货币制度。都用铜钱,那当然好。不过唐朝时铜料就不够用了,现在就更不行了。因此,宋朝只能沿用五代时的老办法,在某些地区采用铁钱,以缓解压力。

这就潜藏着一个麻烦:铜钱区和铁钱区,这区域之间的贸易怎么进行?怎么结算?怎么汇兑?

这也算是上层建筑阻碍了经济基础吧。货币的现状,阻碍了商业的发展。这问题在唐代就有,到宋代终于该突破瓶颈了。

上一回我已经提到过,宋朝货币形态的突破,就发生在巴山蜀水地界。

俗话说:“天下未乱蜀先乱。”这话有一定道理,四川是个相对封闭的地方,但人们的思路却往往敢为天下先。

四川是“天府之国”,老天一向比较照顾,在宋代就是大宗农副产品集散地,它的盐业、冶铁业也比较发达。可是这样一个地方,却是全宋唯一的“铁钱区”,这就有点尴尬了。

当时川人用的铁钱,小钱每10贯重65斤,折大钱1贯。而大钱1贯,重12斤。到市场做买卖,如果带的大钱有二三贯,就累的直喘了。商人不是特种兵,这可怎么吃得消。

当时买一匹布要多少钱——2万钱,那就是20贯,重120斤。无论买方还是卖方,只要进行一匹布的交易,就得“赶着你的马来”。钱太重,这成了引发货币革命的直接导火索。

一般金融学书籍上都讲,是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,引起了货币的改革。可是商品经济到宋代起码已经发展1000多年了,也没引起过什么大变革,所以商品经济发展这个“一般性前提”实际上并没有意义。

凡是导致一种变革的诱发因素,必



这也算是上层建筑阻碍了经济基础吧。货币的现状，阻碍了商业的发展。这个问题在唐代就有，到宋代终于该突破瓶颈了。



GURENSHANGDAO  
古人商道

然是一件极端荒谬的事。

四川人实在是背不动这狗日的铁钱了，这就是诱发因素。于是，世界上第一批纸币诞生了。用纸当钱，怎么样？这下子就不需要特种兵的身体素质了吧。宋朝最初的纸币，叫做“交子”，是一种早期的信用货币。

这又是一个新概念——什么叫做“信用货币”？

请记住，现代的信用货币有三个特点：1、国家法律予以保障；2、不以任何贵金属为基础，独立发挥货币职能；3、人们对它有信心。

比如说什么支票、汇票、纸币、钢镚（辅币）、你的银行存款，一直到最时髦的电子货币等都是。它是货币，可以用来买东西，但它的物质载体本身，基本就没有什么价值。这一点，与金、银、铜等本身就有价值的金属货币很不同。举例来说：你的银行卡，你的网上银行账号，那是钱吗？那上面不就是一组数字吗？可是为什么你相信它是钱呢？因为有银行信用为你担保。懂了吧，这就是信用货币。

其实我们国家在宋代以前，早就有过信用货币。

在西周，有过一种信用货币叫“里布”。其形态就是一块布，长二尺，宽二寸，上面写有币名、金额、发行者签章。持有人拿着这布条，就可以买货物，也可以转让。在春秋战国，也有过“牛皮币”，专用于牛的买卖。买家支付了买牛款，先不把牛牵回家，而是从卖家手中拿回一块牛皮，上有卖家的姓名或者特殊符号，持有牛皮币的人，随时可以向卖家兑换牛。汉武帝时期发行的“白鹿皮币”，价值40万钱，也可以沾上信用货币的边儿。

但是这些信用货币，都是在一定场合下才使用的，不可能在市场上广泛流通，它们和铜钱的功能还不大一样。这次宋朝的交子就不同了，顾名思义，它就是用于商品交换的媒介物。

交子跟现代的纸币很相似，也是采用特定的纸张，铜板印刷，有版式，有图案，有花纹，有面额，有发行者签章，可以流通，可以转让，可以从发行者那里兑换铜钱。

这不就是钱吗，它跟钱有什么区别？

还是有一点区别的——它只能在发行者的信用范围内使用。比如出了四川，就是废纸一张了。因此它还不能完全等同于金属货币。



你看看,我们古代宋朝的人,多能耐,为世界人民提供了多少发明创造啊。

据权威史书记载,交子最早是由民间自发产生的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说:当初四川的邛、嘉、眉等州,因为闹起了李顺起义,停止了铸钱,民间的钱不够用,所以才用起了交子。这个说法,不大通。李顺起义是太宗时代就闹起来了的,不至于大宋开国不久就闹起了钱荒。

真宗景德二年在四川铸大铁钱,才有可能产生交子的真正原因。不仅宋人有不少是这样认为,就是《长编》也说“蜀人以钱重,私为券,谓之‘交子’,以便贸易。”铁钱太重,商家搬不动,就搞代用券,这是有先例的。前面说过,五代十国马殷的楚国,就有过商人嫌铁钱重而“指垛交易”的事。

交子的流行,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。开始是由商家出具收据式的“楮券”,这就是最早的交子。就一张纸,两面都有出具人的印记,有密码花押,字色红黑相错,票面金额是临时填写的,各家的样式也不统一。

这就是所谓的“私交子”。商家的这个灵感,来自唐代的“飞钱”,两者在功能上很相似。这多少解决了一点问题,拿它能顶钱用了,但是信用很有限,也不能够大面积流通。

后来,成都有16家富商联手,以自己的财富作为信用担保,成立了交子铺,统一发行交子。这些富商,就叫“交子户”。统一发行后,信用就好得多了,持有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转让,你只要向交子户交钱,就可以拿到交子。在四川境内无论远近,也无论几千几万贯的买卖,只要持有交子,就可以交易。

私交子三年为一期,到期要换发新的。在兑现或者更新时,交子户要收取30文“工墨费”。可是在此之后,因为有的富商生意衰落,交子不能兑现,引起了不少诉讼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四川的财政官员对交子跟踪研究了一个时期,认为可行,就在仁宗天圣元年(1023年)决定官办。他们奏请朝廷,在四川成立了“益州交子务”,于次年二月正式发行“官交子”,同时禁止民间发行私交子。官交子也是三年为一期(称作“一界”),期满收回换发

新的,相当于年检。换发也要扣除30文工本费。

在发行之初,官交子的样式基本模仿民间,金额也是临时填写的,数额可以无限高,加盖本州印章,只限于四川境内流通。后来官交子逐渐成熟,用三色套印,票面极为精美。数额也有了限定,是事先印刷好的,分成几个等级,从一贯到十贯不等。后来又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。

官方这次发行交子,是非常讲究科学的,设定了最高发行限额,每年最高的发行额为125万余贯,还建立了准备金制度,以四川的铁钱做准备金,每次36万贯,约为发行额的28%。

官府的事,只要认真,就能够做好。一直到神宗初年,官交子的发行和流通都非常稳定,管理得很好。

后来出了个聪明过人的宰相王安石,他对国家太穷感到痛心,一心想“富国”,就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政策改革。

他这一改,情况就有点复杂,我们后面再谈。

## 官府一印纸币就印上了瘾

宋朝的纸币大行其道,当然也不能忽视更深层次的原因,那就是跟唐朝的困惑一样:铜太少。

铜矿资源是有限的,开采能力也受限制,可是货币需要量是成倍增长的,两下里不能成正比。而宋代还有一大问题,比唐时还要严重,那就是铜钱外流得很厉害。

北宋时,宋跟辽有大规模的贸易,南宋时,还有发达的海路贸易,这都是铜钱流走的渠道。周边国家生产力水平低,铸钱能力不强,他们就盯住了宋钱,想用现成的。宋朝在边境地区设有外贸市场,叫做“榷场”。从宋太宗时起,先后在宋境内的镇州(今河北正定)、雄州(今河北雄县)、霸州(今河北霸州)、安肃军(今河北徐水)、广信军(今河北徐水西)等几处设立了榷场。后来和西夏之间,也有榷场。

因为内地盐缺,辽国的盐就通过贸易渠道源源涌入,宋朝的钱也就纷纷流走。这是国家贸易方面,另外还有私人贸易上,辽国人卖给宋朝人牛羊,也弄走了大量铜钱。南渡之后,宋与金之间也有榷场,情况也是一样。那时金国的商人叫

流通都非常稳定,管理得很好。  
一直到神宗初年,官交子的发行和官府的事,只要认真,就能够做好。





“北界商人”他们来到南方，声言卖货只收现钱，且允许短陌（不足一贯算一贯）。史书说他们“意在招诱”，也就是弄铜钱来了。

宋朝境内的唯利是图之徒，经不起这诱惑，见允许短陌，可以占便宜，便大买其货，于是铜钱又源源不断流向金国。南宋由此闹开了钱荒，朝廷为此伤透了脑筋，曾在淮南、京西和湖北等边境地区罢铜钱，只允许商民使用铁钱，布置了一道货币隔离区。

海路贸易也是漏洞之一，尤以广州为甚。南宋曾制定过严厉的刑法，禁止铜钱从海路外流。当时规定：只要商人用铜钱买“蕃客”的货，100文以上就定罪。4贯以上判徒刑一年，累积20贯以上黥面（脸上刺字）并处劳役。广州地方官府还规定，各国商船离港前，必须先报告“转运司”（财政厅），由官员亲自登船检查，不得夹带铜钱出中国界。

但是，山高皇帝远的事，哪里禁得住？金银铜铁各种钱都在外流，就没停止过。以至南宋后期规定：南方的国际贸易实行物物交换，中国商人只能以绢帛、织锦、瓷器、漆器支付，这才稍好了一点。

交子出来后，好得多了。这是一大便民措施，一开始确实是促进了商品流通。不仅政府不用愁铜资源紧张了，百姓也轻松了。腰里连一贯钱也不用缠，揣几张纸票就可以上路。交子好用，官民都乐。后来官府也在邻近四川的陕西、山西和甘肃一带发行，不过都不很成功。

还是四川的交子有信誉，后来通过商人携带、给军人发饷等途径，也流通到了陕西一带，形成辐射效应。到宋徽宗的崇宁三年（1104年），就连京西北路（今洛阳）也开始使用交子了。

可是后来，渐渐地产生了一些弊病——不是老百姓不守法，而是政府自己打起了歪主意。

交子这东西，不是一印就来钱吗？那么政府也有缺钱缺得火烧屁股的时候，怎么办？——狗急跳墙，印交子不就成了吗？先解决了再说。

宋仁宗庆历年间（1041—1048年），朝廷在西北用兵，缺钱，就由四川官方印了60万贯交子，在陕西发行。这一批计划外增发的交子，是没有准备金的，宋代叫“虚行印刷”，属于财政发行。这等于直接从老百姓身上刮钱。

好在这一次的影响还不小，老百姓默默承受了。可是官方得寸进尺。宋神宗熙宁五年（1072年）发行新交子时，旧交子居然不收回，



GURENSHANGDAO  
古人商道





「钱引」的命名,应该说更科学一些了,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「兑换钱的凭据」。

两界一起流通。

这下我们都能看明白了：这不等于把交子贬值了一半么？

在四川流通的交子一多，当然就造成通货膨胀。宋哲宗时代，为了对付西夏，又不断在陕西增发交子，筹集军费，一次增发几十万贯、几百万贯，政府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这么满天飞的交子，贬值得贬到啥程度？

到了元符年间（1094—1098年）换发交子时，朝廷规定，要交回官府五缗交子，才能换到一缗新交子。老百姓的财产，无缘无故就缩水了五分之四。

看来古代的经济有两条规律，看官们不妨可以记住：

一、凡是和平时期出现大幅度通货膨胀（物价飞涨），那都不是“自然现象”，而是政府用了财政手段在敛钱。

二、如果哪个行业的物价莫名其妙地暴涨，就说明哪个行业的奸商在掠夺老百姓财富，无一例外。

## 宋朝纸币是怎么变成废纸的

这样的情况持续到了宋徽宗时代。

宋徽宗也要和西夏开战，也需要军费，还是靠发行交子解决——屡试不爽的法子为什么不干？

宋徽宗厉害，竟然一界就发行了2600万贯，是当初一界的20多倍。而且不设准备金，旧交子也不准兑换。这么多的交子，光在一个地方流通，肯定消化不了。于是又扩了流通范围，把交子改名“钱引”，号召全国各路都用，但最后只在北方才有人使用。

“钱引”的命名，应该说更科学一些了，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“兑换钱的凭据”。

在北宋，官府的盐茶专营部门有所谓“盐引”和“茶引”，是发给经销商人的凭据，商人向官府付了货款以后，拿着这个凭据到加工厂去领盐或茶。“钱引”一词，就由此引申而来。到南宋时，因为朝廷养活的官比北宋还多，军费也更需要

钱，钱引的发行就更疯了。宋高宗的时候，居然三界并行，发行额达到3780多万缗。几十年后，更是达到疯狂的定点，计有8000万缗的钱引在市场上流通。

光用钱引来敛财还不够，后来南宋还出现了新的纸币。

其中一个叫“关子”，有点像唐代的“飞钱”。

绍兴元年（1131年），南宋在婺州（今浙江金华）屯了大量的兵，但是那地方水路不通，给士兵们发放的大批现钱运不过去。几万大兵要吃饭，怎么办？朝廷就让婺州政府下令，由当地商人暂垫现钱，发给商人“关子”做为收据，等商人们以后到杭州做生意时，可以凭关子在杭州领到现钱，也可以领到茶、盐、香料或钱引。每垫一千钱，政府还付给十钱的利润。后来，关子的发行渐渐又扩大到了两淮、湖广。

关子也是印刷的，票面价值为五等，使用期为两年，可以用做支付。这就跟纸

币无异了。还有一种是叫“会子”，这是一种后起的纸币，但渐渐成了南宋主要的流通纸币。

会子一开始也是起于民间，是民间自发印刷的兑换券，也叫“便换会子”。

后来由官家垄断发行，先是在杭州城内流通，后来依次扩散到两浙、两淮、湖广和京西各地。会子的面额，起初是一千、二千、三千的三种，可与现钱并用。后来又增发了二百、三百、五百的三种，由红蓝黑三色铜板印刷。它的票面文字很有意思，上半部分是一则悬赏文字，写明伪造者处以极刑，并重赏告发人。此外，票面上还印有非常醒目的面额和发行机关“行在会子务”（首都会子发行所）字样。

会子的性质，显然就是纸币，一开始还发得比较谨慎，情况最好的时候，社会上只有200万贯在流通，成为市面上的难寻之物。

物以稀为贵。当时商旅往来、贸易，都竞相使用会子，甚至有“会子重于黄金”之说。政府的纳税和发饷，也是现钱和会子各半。如果情况就这么保持下去，南宋倒是有了一种信誉可靠的纸币。当时的宋孝宗也很明白事理，知道会子之所以好用，是因为控制了流通量。他说：“大凡行用会子，少则重，多则轻。”

可是事理再清楚，也挡不住人的欲望。跟在他后面的几位皇帝，脑袋就不那么清楚了，会子越发越滥，一开是规定三年为一界，每界的发行限额为1000万缗。到后来，旧会子每界延长使用三年，新会子的发行额也增加到3000万缗。这还不算完，40多年后，发行额竟猛增至1.15亿缗；10年后，又增至6.5亿缗，比当初的每界的定额多出517倍。

政府的印钞机为什么这么疯狂？这是封建国家的一个规律——很简单，就是一个“谁养活谁”的问题。

老百姓通过纳税，养活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官僚阶层，而国家老是嫌钱不够用。宋朝经常有些额外征税，征了一次之后，就变成常例，年年都征。但是，加税并不是好办法，老百姓看得见负担在增加，很容易激起民怨——太平盛世，老是出宋江、李逵什么的也不太好。

于是，多发货币、制造通货膨胀，就成了朝廷敛钱最快、而又最隐蔽的手法。

老百姓当中有几个懂经济学的？他们只是觉得钱越来越“毛”了，也有怨气，但不会怀疑到是政府在抢钱。

当然也没玩好，把这套把戏玩穿帮了的。在大宋的1000多年前有王莽，大宋的800年后有蒋介石，都是没把金融花活儿玩好，没几

年就把政权给玩垮了。

读者们看到这里，大概要为宋朝人担心了，不仅有那么多的年号钱要逐个记住，还有三种纸币要分辨清楚。

事情还不止于此。令人感到诧异的是，中央集权最厉害的宋朝，地方上居然也印了纸币，川陕、两淮和湖北三地，都在南宋高宗初年发行过交子或会子。

其中川陕发行的是“银会子”，是可以兑换银子的，面额有一钱、半钱的两种。这是中国第一次出现银本位制纸币，但只限于局部地区使用。

另外陕西兴元府（今汉中）还发行过一种铁钱会子，每年发行240万贯，也是只限在当地使用。

南宋时的皇帝，被金国军队驱逐到了杭州，朝廷对川陕大片尚未沦陷的领土，大概也顾不上了，所以地方上才有机会发行纸币，以维持本地市场运转，这是战时的特例吧。

宋朝养的官员多，又经常要进行战备，所以这个王朝敛财也就格外狠一点。

纸币的发行，到后来已经不管准备金充足不充足了，而且不顾市场的需求量，缺钱了就印，印出来的就是钱。前面讲过，宋哲宗元符年间更换交子，曾以1:5比例以新交子兑换旧交子，这等于是一次货币大贬值。后来，宋徽宗大观元年（1107年）新增发交子2000多万贯，两年后又改发“钱引”，原有的交子可继续使用，但不能兑换新发的钱引，这就等于把你的财产再贬值一次。宋徽宗是个会享受的皇帝，他只管享受，买单则是底层人民的事。

到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时，“国际环境”不大好，财政、军备都急需用钱，就变本加厉，新增发的钱引一次就是4000万贯。这么多的货币投放下去，贬值立竿见影，实际价值仅为过去钱引的40%。30年后，市面流通的钱引更是跌得惨不忍睹，面额一缗（一千钱）的，实际上仅值一百钱，缩水90%，你再怎么牛的千万富翁，也该破产了吧？

朝廷这样做，有它的道理，这是为了让国家财政不破产。你们百姓，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，也替朝廷分担一点吧。

到南宋后期，历次的会子已累积发行了6.5亿贯，其中有两界会子，政府无力收回，就宣布“永远通行”。为什么永远通行，因为几乎是废纸一张了。南宋末年权奸贾似道当政，政府还要继续敛财，发行了一种“金银现钱交子”，面值一缗可兑换原有会子的三缗。





这是纸币中的大钱，榨干你骨髓没商量。金银交子发行之后，物价腾飞，原来的200文会子，已经买不起一双草鞋了（见《续通考·钱币一》）。

这是宋朝建国300年时的情况。这时候再回头看北宋初年的物价，简直便宜得跟天堂一样——建国40年时一斗米价10文，建国65年时，一斗米价也不过100文多。当然，在这300年间平民的收入，多少也能水涨船高，要是还停留在宋初的水平，那就得饿死一百回了。那么，物价如此飞涨有什么意义？

有。

它虽然是泡沫，但其中也有“干货”。这里你要看明白：“干货”是被谁一次又一次地拿走了？大宋再怎么是个大棒子，也架不住这么一次次抽血。它终于在纸币满天飞中，亡于蒙古人了。

人心离散，也是南宋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很难想象，被榨干了血汗的老百姓，会有很深的感情来保卫这个国家。等到气势汹汹的蒙古军拿下江南，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的时候，他们用自己的钞票2贯兑换南宋“金银交子”100贯（值白银1两）。按此比价，相当于早期发行的会子4500贯，你看看，南宋会子发来发去、换来换去，就这样比纸还要贱了。

钱，就是这么被“虚”掉的。

金融的游戏，有时候挺绕弯子，啥时候也不要以为你自己很聪明。比如你是一个宋朝人，有存款10万贯，要是不动它，每过三年就会被蒸发掉一点，直到蒸发完为止。那么，是否等于这10万贯，都被朝廷搞走了呢？当然不这么简单，朝廷说什么也不能明抢，它是通过一次次的货币贬值，从你这里逐次累积拿走了大约6万贯。余下的4万贯，才是在贬值中被彻底蒸发掉的。不这样“蒸发”的话，朝廷也就拿不走那6万贯（注：这些数字都是打比方）。

——可怜的宋朝人，朝廷若想跟你玩，你是玩不过人家的。

## 在宋朝买二手房可能挖出黄金

到了宋朝，就货币来说，还有其他一些很有意思的变化。

当时绢帛已正式退出货币行列，但是在对辽和对金的“岁贡”中，仍占有主要地位，所以绢帛实际上还是具有一定的货币性质。

黄金在宋朝也基本上变成了贮藏品，不过也有资料表明，黄金可以用作支付，或用于赏赐，或用于政府开支和纳税，也具有货币的性质。与绢帛和黄金的退隐正相反，白银在此期间脱颖而出，地位大大提高。不仅广泛用于赏赐、馈赠、贿赂，而且政府发兵饷、收税都规定了要用白银。到了北宋中期的仁宗年间，白银正式作为法定货币，并有了固定形状，即铸成“铤”。后来，“铤”又转音为“錠”。

大银锭，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种束腰形的“银元宝”。上面镌刻有文字，注明铸造地、用途、重量、主管官吏、匠人姓名等等。有的文字还相当多，可达到30多字。银锭大的为50两，小的有3两到25两的几种，用的时候要称重，还要鉴定成色。

黄金自从东汉以后产量逐渐减少，到魏晋时已非常短缺。而宋代的白银产量又恰恰大幅增多，再加上西域诸国都在使用白银，影响到宋朝，这就使得白银不仅正式进入流通，而且还充当了国际贸易的主要货币。

黄金和白银的地位，在宋朝发生了明显的易位，昔日的小老弟现在成了老大哥。

白银地位的上升，也预示着铜铸币地位的下降，中国的金属货币从这时起，就显露出了向贵金属过渡的苗头。

宋朝也铸了大量的金钱、银钱，主要用于赏赐和节庆纪念。比如，按宋朝的风俗，每逢皇子、公主诞生，皇帝都要发给高级臣僚和皇亲国戚“浴儿包子”，也就是御赐红包，里面包有金银钱和其他金玉小玩意儿。

老百姓也用金银钱。在汴京的民间，新郎新娘入洞房后，要有妇女朝新人身上洒金银钱和果子，以示吉庆。

宋朝的有钱人，还非常喜欢贮藏金银，几乎家家都有“窖藏”。有个叫余深的，曾经当过宰相，他把自己的全部银子，以百锭为一个单位，埋在地下，上面用土盖住夯实，再砌上砖。还有一个大官僚倪思，更动了脑筋，有银子不藏在地下，而藏在房子的檐溜里或者夹墙内，让贼人找不到。

有时候年头多了，隔了几代人，谁也记不住房子底下埋了些什么。要是哪家想转让住房，就会有问题：万一下面有大宗窖藏怎么办？

这难不倒宋朝人！

当时在洛阳做二手房交易，买方要多付一笔“掘钱”，作为将来有可能挖到窖藏金银



可怜的宋朝人，朝廷若想跟你玩，你是玩不过人家的。

的一种补偿。你瞧，怎么样？做个宋朝人，生活起来也很有趣吧？

这里就顺便讲个小故事，南宋初年有一个著名的抗金将领，叫张俊。他早年英勇善战，杀得金兵个个愁，是和岳飞、韩世忠齐名的抗金英雄。可是到后来这人却变质了，据说是参与了秦桧诬陷岳飞的密谋。晚年从军职上退下来，受封为清河郡王。宋高宗给他盖了华丽的王府，他本人也开始大肆敛财。

王爷敛财，那还不容易？他总共拥有田地70万亩，年收租米64万斛。史料记载：他家里“园池声伎甲天下，每宴十妓为一队，队各异其衣色，凡十易始罢”——席间出来10队舞女，每队10个，衣服颜色都不同。也就是说，他一共养了100个歌舞小姐。这就是在宋朝惊世骇俗的“百妓宴”。

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年）十月，宋高宗去张俊家里拜访。张俊摆宴接驾，进奉上等酒食、果子几百种，又送给高宗金器1000两、珠子69000多颗、玛瑙碗20件、各种精细玉器40余件、綾罗锦缎1000匹。这顿饭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家宴，空前绝后。

什么韩熙载？在张王爷面前，不过小菜一碟罢了。

当时的人对张俊疯狂“捉钱”的行为极为不屑。宋人钱康功《植杖闲谈》记载：有一次，宋高

宗与秦桧、韩世忠、张俊等几个人一起看戏曲。只见有两个伶人走到台上，一个扮成善观天象的，说：“世间贵人，必应天象，用浑天仪窥之，则见星不见人。今可用一铜钱代。”说罢拿出一枚方孔圆钱来。

另一位演员让他从钱眼里看宋高宗，他看了看，答曰：“帝星。”

再看秦桧，答曰：“相星，”

再看韩世忠，答曰：“将星。”

又让他窥视张俊，不料却答道：“不见星。”

众人大骇，令其再窥，该伶人又道：“终不见星，但见张王在钱眼里坐。”

座中人听罢，大笑不已，连高宗也笑疼了肚子。

这就是我国俗语“钻钱眼”一词的由来。

从善打仗，到善捞钱，高宗对这样的下属极为欣赏。张俊在死后又被升了一格，追封为循王，史称“张循王”。

这位张王，在窖藏方面，也很有创新思维。他把家藏的银子每100两铸成一个大球，放在家里。这些10斤的大球，赶上现代的小保险柜了，不怕小偷来偷。

他还给这些银球取了最恰当的名字，叫“没奈何”。盗窃分子们——遇上我张俊，你们就是没奈何吧？





## 纸币的狂欢与宋朝的崩溃

纸币是宋朝人的发明。这东西出来后,当时的人对它就有研究,也颇有心得。古人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,一天到晚都浑浑噩噩,只知道吟诗作画;他们可是什么事都想弄个明白的,有一股子执着劲儿。现在的很多人太能厚今薄古,以为自己无所不懂,古人根本不在话下。

可是现实往往跟这种人开玩笑——他们老是在犯古代的错误。

宋人对于纸币的流通规律,有相当系统的认识,归纳起来有两大理论,一是“兑换论”二是“称提说”。

前面提到过的北宋名相文彦博,就是“兑换论”的重要理论家。他认为纸币一定要能够自由兑换成铜钱、铁钱,才能于公私两利。只有自由兑换,老百姓才信任纸币,官家发行纸币才能顺利,这样,每发一次纸币就等于政府获得一次厚利。另一方面,对于民间来说,因为纸币毕竟比铁钱方便,只要随时可兑换,他们就愿意用,并且信任不疑。

北宋末期的温州瑞安,出过一个大知识分子,叫周行己。他对纸币也有高论。

他说,纸币一定要有准备金,以供人们随时兑换,但准备金不一定是十足的。好比说,发行了300万贯交子,那么一定会有相当数量的交子在流通中,人们不会拿它们兑换铜钱;另外还有纸币耗损的、储存起来不用的,这样加起来大约占了100万贯的样子。因此,只需有200万贯铜钱做准备金(他称之为“实”),就能支持300万贯的交子流通。他对“准备金”这一概念的认识,是非常科学的。

在南宋时期,无论关子、会子,都出现过大幅贬值。于是南宋人对稳定币值也想了很多办法,当时称为“称提之说”。

“称提”就是平衡之意。最早提出这个理论的,是南宋初年的宰相沈该,他主张要调整好铜钱和纸币两者的关系。只要其中一种的价值稳定了,同时物价也保持稳定了,另一种就不会出现大幅贬值。

他主张,政府手里应该随时有大量铜钱,用主动兑换的办法来稳定纸币的价值。他建议,宫中应该储备百万缗钱,一遇到纸币贬值,就拿钱去“买”纸币,纸币自然也就停止贬值。

宋人陆续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,咱们在这里归纳一下:

1、借助铜币来稳定纸币价值;

2、实行新、旧纸币折换,在折换时,趁机把流通过滥的旧币贬值;

3、采用严刑峻法,迫使老百姓按纸币面额来使用,不允许民间将纸币擅自贬值;

4、在财政拨款和税收上,采用铜币和纸币按比例搭配的办法,以提高纸币在民间的信任度;

5、严禁铜钱外流、藏匿、销毁,保持一定数量的铜钱与纸币并行流通,使人民不至于对纸币价值产生怀疑;

6、减少政府开支、减少纸币发行量,堵死通货膨胀的两大根源;

7、如果准备金实在不足,就用有价值证券(新形式的纸币)和实物,主动去兑换纸币,让老百姓觉得纸币还是可以随时兑换的,纸币也就不至于贬值得太厉害。

这里面,有高招也有损招,我想,读者自会分辨。

这种“称提之说”也得到了南宋几代皇帝的认可,屡次实行。但是有时效果很不好。原因何在?

宋末元初有个大学问家叫许衡,他看得明白,曾经这样说:“但见朝廷每次‘称提’之令一下,百姓反受其害,而钱也越短,嘉定年间换发交子用一换二,这是贬了平民一半之财,嘉熙年间又用一换五,这是贬了平民四倍的财富,朝廷无信义,以此为甚!”(见《许文正公遗书·楮币札子》)

这位许老夫子对“程朱理学”很有研究,后来降了元,担任了大元帝国的最高学府校长(国子监祭酒),成了蒙古贵族子弟的老师,也为元世祖忽必烈出了不少治国的好主意。

他降元,被当时人看成是没有气节,后来也未得重用。但是他看南宋的问题,是看得太透了。他的这段话,其实是点出了南宋败亡的要害——朝廷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掠夺人民财富,无义之甚,那么,危急关头又怎能指望自己的臣民尽忠?

所以说,宋朝的覆灭,也跟钱有关。

## 懂钱和不懂钱的人就是不一样

宋代的文化发达,官员们生活闲适而优裕,所以研究货币理论的人也就特别多。

我们大概都知道宋朝有个大科学家叫沈括的,写过一本科学著作《梦溪笔谈》。这人还是个高级官员,参与过王安石变法,当过财政部的长官——三司使。这个官职,在地位上仅次于宰相,俗称“计相”。



朝廷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掠夺人民财富，无义之甚，那么，危急关头又怎能指望自己的臣民尽忠？







好说的。  
财产贬值，这没有什么  
钱贬值，就是老百姓的  
通货膨胀就是钱贬值；

沈括在科学上建树甚多，是个奇才，他是科学史上第一个发现“地磁偏角”的人，比欧洲人早了足足400年。在物理学、数学和地质学上，都有发明和创见。

货币，也是他的研究对象。

我们已经说过，宋朝在货币问题上，有唐代的遗传病，就是钱币数量不够用。“公私上下，并苦乏钱。百货不通，人情窘迫。”（《宋史·食货志下》）

钱荒是怎么造成的？沈括有他的看法，其中较有独到见解的，有下面两条：

一是人口增多，公家和私人的开支也比较生猛（生齿日蕃，公私之用日蔓）。几个因素加在一起，钱币不够用就不足为怪了。

二是公私积蓄的钱币过多。公家实行新法收税费，收来了许多钱币，就藏在国库里，民间也喜好窖藏，很多富户还习惯把大量钱币当做“镇库钱”存起来，动辄万缗。占住了又不用，这些钱就不能在流通过程中创造财富。

他说得很形象：“有十户人家的小

镇，假如有钱十万，而仅仅藏在其中一家，那么百年后也还是十万。如果投入流通，让别人能享受这十万之利，十户人家都参与流通，就是百万之利。流通不已，钱就将多的不可胜数了。”

他说，如今最小的乡镇，平常人家都藏着万缗钱，假如让它们流转天下，何愁钱不够用？他主张要减少公私积蓄，加速货币周转流通。他认为官库和富户占住了钱币，不让货币流转，就不能生成新的财富，于私人、于社会都没有益处。

其实他说的，也没什么新鲜的，不过，到今天也还是有人转不过这个弯来。

前面说过的北宋大学问家周行己，对金融问题的研究，在当时影响也非常大。周老夫子是属于“永嘉学派”的，专长是搞儒家理论，还不是专门的金融学家。

永嘉学派，现在的人不大知道了，在宋朝，这是和朱熹的“理学”、陆九渊的“心学”呈鼎足之势的一大流派，专讲“功利之学”。他们这群人，以祖籍永嘉（今浙江温州）的为多，所以才有这个命名。他

们的观点，和孔子有一个很大不同，就是主张把“义”和“利”统一起来，“不以义抑利”。

由此之故，周行己对“利”也就看得特别透。

他对政府发行大钱很不满，认为这是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源。他说，大钱的价值，仅值三枚小钱，却要当十，这当然要引起物价上涨。而且物价上涨的速度，要比你那通货膨胀的速度还快——“钱之利一倍，物之贵两倍”。

他提醒说，政府想榨取民间油水，老是铸大钱，但民间也不全是傻瓜，跟着就会有私铸。而且就算官府停铸大钱了，私铸也不会停，物价就会一直涨下去。这个连锁反应，责任还在官府。

他认为，通货膨胀就是钱贬值，钱贬值，就是老百姓的财产贬值，这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但是国家是否就能通过这很不地道的通货膨胀，捞到很多好处呢？也不见得。因为政府本身也要购置商品，同样也要受通货膨胀之苦，要花费更多的行



政支出。因此,铸大钱纯粹是短视行为,饮鸩止渴。

周行已是个老夫子,终身只当过教育官员,但他对钱的问题,看法比有的宰相高明多了。

宋朝的宰相,反而是有很多人对钱的问题看不大清楚。

我们就拣两个最著名的宰相来说。一个是王安石。

讲宋朝的政治或经济,不能不提到这个人。王安石倒是个忧国之士,当了副宰相之后,就开始在神宗支持下变法。他在任上还不到十年,被迫下台后,他的新法继续在推行,前后共实行了17年。

王安石抱的是富国强兵的大志,在当时民本意识的浓厚氛围中,大家都讳言“富国”,所以他只提“理财”。

理财的目的,还是为了解决财政紧张的问题,可是他也不说,只说是为了“抑兼并”,为了帮助弱势群体。

在他的一系列新法中,与货币流通密切相关的,是“青苗法”和“免役法”,在这里必须说一说。

所谓青苗法,就是国家对农民的信贷,一年两次,用的都是钱币,因此钱币的需要量就猛增了上去。

所谓免役法,是把差役改为募役,各户按资产情况出“免役钱”,然后国家拿这钱去雇人从事劳役,免得老百姓耽误种自己的庄稼。但是这也增加了钱币的使用量。因此,从神宗时候起,官府铸钱量也开始猛增。

钱,源源不断造出来,但仍不够用。这里面既有原先钱币大量流到境外的原因,也有新法带来的新问题。实行新法后,要求老百姓交钱的时间比较集中,规定每年老百姓还钱的时间是两次,到时间家催逼得很紧,撵得鸡飞狗跳墙。民间急着用钱,钱币当然就非常紧缺。

前面提到过,因为实行新法,官府每年都收上来很多钱币,都贮藏在官库里,实际的流通量也就大大减少。

还有就是,本来钱币就不容易流通到穷乡僻壤,现在要求农民交钱,农民又上哪儿去弄钱?那时候又不能卖血,农民被逼无奈,只得“伐桑枣、卖田宅、鬻牛畜”,惨啊。

道理很明白:一闹钱荒,物价就下跌,农民为了交钱,就得忍痛贱卖农产品。这就使名义上的利民政策变成了害民恶法。

王安石的变法,把农民坑得不浅,朝中的一大批官僚,必然要借民间舆论反对新法(他们也不完全是政治保守派,起码有一部分还是关心民生的),再加上其他政治因素,最后导致新法完全失

败。为此王安石得了个绰号,叫做“拗相公”。什么叫拗?一意孤行也。

王安石才高八斗,为人超脱,平时大概不大沾手钱这种俗物。没有这方面的实践,自己在理论上,有缺陷就很难察觉到。他的变法,千好万好,单单就忘了农民搞钱很不容易这一基本前提。

另外还有一个名气比王安石还大的宰相,就是秦桧。

秦桧臭名昭著,他的种种“事迹”,就不用在这儿多讲了,只说他执政时期跟钱有关的两件事。

南宋各代皇帝也大都铸过铜钱或铁钱,只不过发行量不大,因为铸造成本太高了。钱币本来就少,咱们的邻居日本,偏偏又喜欢用宋朝铜钱,他们的商船来宋境,都要偷偷带走大批铜钱,南宋的商船和水军,也都热衷于偷运钱币卖给日本人。

这样,南宋闹钱荒,就是家常便饭。

南宋绍兴年间,正是秦桧当政时,京城临安又闹开了钱荒。当时严重到市场交易都没法进行了,朝野上下人心惶惶。对这个困扰了人们千年的老问题,秦桧还能有什么办法——你放心,能害得了岳飞的人,自有他的一肚子诡计。秦桧想了想,就叫了一个理发匠来给他理发。

理发匠万没想到,这一次理发,堪称人类理发史上报酬最高的一次。秦太师叫人拿出了5000枚当二铁钱作为工钱。这就相当于1万枚标准钱了。理发匠目瞪口呆。秦桧整理好衣冠,郑重其事地说:“过几天将有圣旨下,此钱不可再用,你可速去买些儿东西,花掉它了事。”

理发匠千恩万谢,出门后就直奔市场购物,一面还向人散布这一最新消息。秦太师的理发匠说的,还能有假?众人闻风而动,都跑出去倾囊采购。不到三天,京师流通的钱币就大大增加。

钱荒缓解了,绍兴铁钱也并没有废掉。秦桧太懂得世情了,在宋朝,流言肯定比实话管用。

还有一次,京师又闹钱荒,商店里的货物积压,没人买。情况严重到临安府的长官也跑来向他汇报,请他拿主意。秦桧笑道:“易耳!”于是马上就召文思院的官员前来答话。

文思院是从唐代起就有的国家工艺品作坊,专门给皇家制作金银犀玉等器物。还没等文思院几位头头赶到,秦桧又故意派了好几批人去催促,一路络绎不绝。文思院的长官终于气喘吁吁地赶到了。

见气氛已经造足,秦桧就说:“刚才得谕旨,将要变钱法,尔等可先去铸一贯样钱来看看,不日就要把现今流通之钱禁废。”他又定下了期限——限次日中午办好。文思院的官员连忙回去组织工匠试制,忙得一宿没睡。



这消息当然又不胫而走，富贵人家动的最快，蜂拥到市场去抢购——也只有他们有底气扫货。几天下来，市场物价飞涨，陈货一扫而空，柜台里钱币推挤如山。那边文思院的官员忙了个半死，把样钱如期呈上后，就再没下文了（见冯梦龙《智囊》）。

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对秦桧搞的这两次心理战有评价，说“贼桧亦有应变之才”，不过只是“小人之才”罢了。

过去北宋名相文彦博也搞过类似的战术，但那散布的是真消息，以稳定民心。现在秦桧放出的是假消息，让老百姓上当。估计这可能是古人给秦桧编排的故事。要真是这么干，也就等于政治上自掘坟墓了。

但是，谁敢说这样的“狼来了”战术不好使？

## 宋朝的“大户室”也相当震撼

接下来我们该说到宋朝的信用业务了。

宋代的信用事业，很奇怪，不像其他方面都远超过唐代，似乎进步不大。唯一的区别，是政府信贷更为制度化。这个制度，就是王安石搞的青苗法和市易法。

青苗法，前面已经涉及到了。这个办法，王安石在早年当知县时，就在辖区内试验过，他觉得很管用。

这实际上就是农业贷款，具体实施办法是：用国家仓库存放的粮食作为信贷资金，一年分两次贷给农民，让他们做谷种。正月三十日放贷一次，五月三十日放第二次；农民随着缴纳夏秋两税一块儿归还。

“青苗法”的贷出和还贷，都是按钱折算。贷款有数额等级，共分五等，看你的贫富程度而定，最多的贷给15贯，最少的贷给1.5贯。让你用半年左右，政府收利息2分。

按说王安石也还是爱民的，他留了个心眼，没有硬性让农民直接还粮食——要是哪一年粮价高，农民用粮食还贷岂不是要吃亏？所以，一般是按照前10年丰收时的平均粮价折算（因为丰收时谷价较贱），让农民还钱，当然还粮食也行。

这是一种国家信贷，借给农民稻谷

种子，是为了保证贫困农民能维持生产，免得土地被富户兼并。初衷可以说不错，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，拗相公没有想到：农民要是还钱，确实是不吃亏，但很多农民弄不到钱，只能还粮食。还粮食的话，就要按丰年的低价来折算，这样在平常年间或者歉收年头，农民恰恰就要多还很多粮食才行。再加上在具体实施过程中，经办官员不都是孔圣人，谁都想弄点猫腻，结果农民还贷的实际利息付出，往往要比理论上高出很多。

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认为：一切税捐，都应在最适合于纳税人的时间与方法收之，“青苗法”却没有做到这一点。亚当斯密还认为：每一税捐都应善加设计，务使公民在他的财力上受到最少可能的损失，这一点“青苗法”也没有做到。青苗法就是这样，从一部好法变成了恶法。本来是一项扶助农民的好政策，却变成了赤裸裸的官营高利贷。

这一点，拗相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，是绝想不到的。

青苗法因为反对的人多，曾两次被废除，后来减低利率为每次1分，一直实行到徽宗时代。

另一部与信用有关的新法，是市易法。当时在京师和各地，都设立了物价管理机构——市易务。这个宋朝的“物价办”，同时又兼有金融信贷职能。

市易务的工作人员有两种，一是“行人”，就是办事员，二是“牙人”，就是经纪人。都是从商铺和市场经纪人中招募来的。

市易务掌握着一定的资金，可以放贷。具体办法是，商人可以向官府借钱，以田宅或金帛做为抵押，没有抵押物的可由5人联合担保。比较爽的是，商人也可以在自己的货物滞销时，把货卖给市易务，等到该货物好销时，又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回购（类似现在的按揭）。借钱或分期付款回购，在半年内付清的付息1分，一年内付清的付息2分。

王安石自认为脑袋瓜子灵，他以为实行了这个法，就能防止大商人垄断囤积，有利于小商人资金周转——这样不就促进市场流通了吗。

对比之下，王安石对商人可远比对农民优待多了。同是半年期的贷款，农民

要付息2分，商人则只付息1分，同时又没有钱粮折算的问题，所以商人的利息负担要比农民小得多。这种越穷越要多花钱，越富弄钱花越容易的事，你还真是没地方讲理去。

王安石当然想不到，这个新法，在实行过程中也有一些麻烦。比如，大商人是没法垄断市场了，可是官府可以借此垄断市场，什么货物好销了，商人要回购，官府就会趁机抬价。另外，商人方面也知道怎么对付官府，那就是赖账不还，要不就是回购不按期付款，反正就是一个“拖”字。

不按期还款的情况很严重，有时达到“十有五四”，闹得朝廷很伤脑筋——不就是商人欠钱不还嘛，还能治他们什么罪？

近代以来的经济学家都是悲天悯人的，所以西方有人把经济学家称作童话里愁眉苦脸的驴子。唯有凯恩斯是乐观主义者，凯恩斯认为没有政府搞不掂的事。

王安石就是公元11世纪的凯恩斯，可是他用政府手段干预经济，除了把民间闹得鸡飞狗跳之外，什么都没搞掂。再来看其他的信用方式。宋朝的经济发达，钱的流通量也就更大。跟唐朝一样，商民一时手头紧张，比如娶媳妇钱不够用，就可到“质库”去抵押借钱。

质库有民办的，也有官办的。此外和尚在宋朝也再度活跃起来，寺院又成立了典当行，在宋代叫做“长生库”。

那时的寺院都富，主持们也不想让钱都发霉了，所以乐于放债。宋朝的大诗人陆游，对寺院放债这事儿深恶痛绝，认为这么做极为“鄙恶”，应该坚决禁绝——不过他说话没分量，没人听。那时的民间质库，有时候借款的利率也够狠的，最高月息达到10分，有人认为这是“不仁之甚”，简直是趁火打劫。

官营的质库就要好得多，宋代叫做“抵当库”，是从市场“价格办”的有关业务渐渐独立出来的。抵当库比较仁慈，收息很低，是专为解决百姓急难而设置的，不图大利。

宋代也有“飞钱”，不过是完全制度化了的官营汇兑，由朝廷设立“便钱务”，主要业务是从京城往外地汇款。那时商



人汇钱,要先向中央财政部申请批准,每汇一贯,扣除手续费20文。朝廷在这方面很讲信用,对各州官府提出了要求:商人只要凭券(汇票)就可在当地领钱,当日给付,不准滞压,违者处罚(见《资治通鉴长编》)。汇兑最盛时,宋朝每年有280余万贯钱在京师和各地间飞来飞去。同时也有从各地往京师汇钱的,也有各地通汇的,一般是收10%的汇费。比较有意思的是,有时候汇钱还不收汇费,反而贴水3—4%。汇钱还给利息,这也太仁慈了,搁到现代人身上,还不得受宠若惊!大概是宋朝时京师缺钱用吧,所以鼓励商人往京师汇钱。后来纸币大量发行,“飞钱”业务才渐渐衰落了下去。

前面说过,宋代的货币特别复杂,金、银、铜、铁、纸一起上,另外还有不同的货币区,所以兑换工作很繁重。承担兑换业务的,是从唐代延续下来的金银铺,到南宋时,又改名叫“交引铺”。

什么是“交引”呢?就是国家颁发的特许专卖证。

宋朝的盐、茶都由国家专卖,商人如果要批销,须先去专营机构交钱,领到一张“盐引”或“茶引”。这东西统称“交引”(也叫“钞引”),凭着它,到盐场或茶场就可领出货来。无论什么东西一专卖,就很赚钱,所以“交引”本身也很值钱,可以互相转让,有如今天的有价证券。

交引的交易,就在金银铺进行,所以金银铺后来就改叫交引铺。

那时的金银铺,可不是小店,而是古代的证券公司大户室。主办者都是京师富商,客户也都是富豪。

据当时的人记载,金银铺“屋宇雄壮,门庭广阔,望之森然,每一交易,动辄千万,骇人闻见”(《东京梦华录》)。这种金银铺,在南宋的临安城内就有上百家。但是再厉害的狐狸,也玩不过猎人。宋朝的当朝宰执大臣们,才是金融界高高在上的猎人。

有这样一件事:大观三年(1109年),朝廷中枢开会议定,当十钱贬值为折三钱。讨论完毕,一散会,宰执们就派人用车装着马上就要贬值的钱,去抢购黄金。京师的金银铺对此竟毫无所知,还高兴这下子可来了大买卖呢。两个月后,贬值令正式下达,金银铺全都傻了眼——玩钱的被钱给玩了。

这信息也太不对称了,京城人都把这事传为笑谈(见《文献通考·钱币考》)。

那时候还有彩帛铺,是做丝绸交易的,性质与金银铺类似,也兼做证券交易。

北宋末年,金兵攻破了汴京城,擒住了徽宗、钦宗“二帝”,又向北宋朝廷索要巨额战争赔款。

北宋的留守大臣们被逼急了,就竭尽全力对民间搜刮,强制征收老百姓财产。他们特别盯住了交引、质库、金银、彩帛这四种店铺,重点搜查,往往从一家店里就能搜出千万两银子——对不起了,国弱,没有办法呀。

你们不是富吗,那就多出点血吧。

## 宋朝需打点的“亲戚”何其多

要说北宋的积弱、屈辱,那还是来自太祖赵匡胤、太宗赵光义。这哥儿俩先后打辽国,都打得不顺,落下了祸根。

一个国家开头弱,就代代弱,所以雄才大略的皇帝,都特别重视开国后的几场大战,务必要打得强邻闻风丧胆。而赵匡胤的策略,是先易后难,先拿下的是比较弱的后蜀、南唐,没有拼了全力先解决北方的大患。这一偷懒,华夏大地上,北宋就多了几个“亲戚”,有辽国、西夏和后来的金国。

辽和西夏还好点,辽是大宋的“哥哥”,西夏是大宋的“臣子”或“儿子”,但是金国却成了大宋的“伯父”。国弱,连辈都降了,这让豪放派词人怎么能心平气和?

我们来看看大宋这几个亲戚国家的货币。

辽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,还保留着古老的风俗,牲口、布帛都是货币,和铜钱、白银一块流通。辽国盛产羊,所以羊的“币值”并不高,据记载一只羊才换二斗小米。

辽的冶炼技术当然也不过关,铸的铜钱很少,辽国人所用的铜钱大都是从境外流入的宋钱。苏辙曾经出使过辽国,回来后说:“北界别无钱币,公私交易,并使本朝铜钱。”

大宋也很郁闷啊:自己国家的铜钱,要让周边几个国家都抢着用,无怪乎要闹钱荒。辽国自己铸的铜钱,多为年号钱,但是数量很少,工艺也不精——有大宋的漂亮铜钱用着,这算不了什么大事。

但是,辽对铜钱的政策却很严厉,是“只进不出”。凡是持有10贯以上铜钱出南京(今北京市)者,统统砍头没商量。没办法,钱不多,法就得严点儿。

辽国在信用事业上,也有一些创举。它在辽阳一带的50余城和沿边各州,都设有“和余仓”,专门进行粮食放贷。这些粮仓跟义仓不同,借出粮食的对象不一定是贫民,谁借都行。国家贷粮的目的,是收取利息,然后用于购买储备



粮。算是“以粮养粮”吧。

辽国早年曾经发过大水灾，许多穷人生活艰难，只得把自己的子女抵押给富户，借一点活命钱糊口。穷人子女到了大户人家，那是不能闲着的，要无偿干活。

辽圣宗知道了这事，大不高兴——这不是剥削吗？于是下令，今后抵押女子替债主做工，要算工钱，以每天10文计算，工钱抵得上债务之后，就要放人家的儿女回家。

这么看来，辽国的政策很仁慈，但就像钱币都有两面一样，辽国也有很不仁慈的一面。因为它的皇帝都信佛，所以寺院办质库放债又成了香饽饽，有的一年收入能高达千余贯。放债利息据说相当高，有的戍边士兵家境贫困，向他们借钱，最后卖儿卖地也还不上。

而这样的问题，辽国皇帝一般就不闻不问了。

再来说西夏。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政权，国号“大夏”。这个边地民族的雄心

也是不小，竟然使用了咱们最老的老祖宗的国号。“西夏”，只是宋朝人的叫法。它幅员辽阔，有自己的文字、制度，完全是仿照宋朝建立了一个完备的国家。

西夏人本来是游牧民族，可他们善于学习，因为长期与汉人杂居，农业技术学得很地道。史书上说他们“耕稼之事，略与汉同”。还有更绝的，是他们把宋朝的瓷器制造技术也学到了手，还融进了自己的艺术特色，生产的瓷器能批量出口海外。

前面我们讲过，西夏和北宋差不多整整打了100年的仗，最后终于讲和，西夏对宋称臣，继而称父；但是宋朝这个“老爹”，只占了辈分上的便宜，却每年要“赐”给西夏儿子大批财物。一开始还只是银万两，到后来竟然达到了银7万两、银器2000两。整个西夏使用的银子，全都是由大宋给提供了。

这个窝囊的大宋，有银子就这样源源不断地给别人，就没有别人给它上供。

和辽国一样，一般西夏人所用的铜

钱，大多是宋钱。

另一方面西夏自己也铸了钱币，基本都是年号钱。文字上分两大类，一种是西夏文钱，写的是“某某宝钱”；另一种是汉文钱，写的是“某某元宝”。

西夏同样也禁止钱币出境。它的南部与宋朝的四川接壤，四川用的是铁钱，西夏就严禁自己境内的铜钱往四川流通，也禁止四川的铁钱流进来。这是怕有人利用铜铁钱之间的差价占便宜，那将会导致境内的铁钱大量流失。

西夏的信贷业，很有它的民族特色。在西夏法律中，有专门关于借贷的条款。这个民族大概是草原的彪悍劲儿还在，有一些条文内容很淳朴。我们今人看了，会觉得那些西夏人很可爱。

比如，西夏法律规定：借债必须归还，保护债权人利益。但有欠债不还的情况应该报官，由官府出面处理，债权人不得强行向债务人索要财物。这一条，体现了很强的物权意识。西夏对于借债利息也有法律规定，无论官债还是私债，利息





由双方约定。一般性质的借款,要是偿付的利息已经与本金相等,就不得继续索要利息了。要是穷人实在还不上钱,可以用劳役顶债。

这两条,都是保护弱势群体的。

如果借债是为了做贸易,那么利息可以是任意比例,但利率不得超过本金数额一倍。借债人若是无力偿还,就由中间人偿还。子弟要是背着家长借钱用于挥霍,家长愿意代偿的就代偿,不愿意代偿的,就由子弟自己看着办吧。

对老百姓典当也有规定,价值10缗以下的典当,不需要保人。假如典的是偷来的东西,一经发现,当铺无罪,赃物归还原主,典当出去的钱,是谁拿赃物来典当的,由谁偿还。超过10缗价值的典当,一定要有人作保。假如是偷来的物品,三个月之后没人来赎当,就要归还原主,贷出的钱就算当铺自认倒霉,什么时候抓到了贼,再由贼来赔偿。

还有不少诸如此类的条文,一方面相当质朴,一方面又极为详尽周到,一点看不出草莽的样子。

法律要制定到这个程度,才能让人有法可依,且不至于给执法者留下太多可玩猫腻的弹性空间。

西夏人的思维方式,就这样既单纯,又明确。

最后再说说把北宋给灭了的金国。这个国家,是女真族建立的,受宋朝、辽国的影响很大,转型也是滴溜溜地快。他们使用的货币有铜钱、白银和纸币三种。

他们的铜钱也是不够用,后来宋朝向金国称侄,每年奉献大量白银,金国就顺水推舟用开了银子。

金国建国初期的40年间,根本就没铸钱币,只用辽、宋的旧钱。而它扶植的一个短命傀儡政权——伪齐,反倒既铸了钱币,又发行了纸币。

金国是较晚才开始发行纸币的,叫做“交钞”,比宋朝的交子要稳定一些,7年才更换一次。它在货币方面的政策,和其他国家大同小异,这里就不多说了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个以赫赫武功著称的国家,在货币史上也有巅峰之举——创下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。

金国末年时,和蒙古开战,为了赏赐军士,就狂印钞票,共印了84大车,运往前线。

印钞票就像印宣传单似的,那还能值钱吗?交钞从此一路狂贬,商人都拒绝接受。

为了稳定交钞的价值,金国的高层领导没

少想办法,比如禁止铜钱流通,对市场贸易、发薪水、纳税等都限令用钞。但是,就算政府推动也没什么效果,交钞最后贬到了每贯只值一文,相当于原价值的千分之一。老百姓都说,这叫钞票“坐化”——没看出有什么动静,就死了。

后来政府又连续发行大钱和“大票”,企图挽救币值,都挡不住交钞一泻千里。民间干脆不管你那套,全都以银论价。若以金国发行的五种纸币依次推算,这个国家的最后20年里,物价上涨了有200亿倍还多,为史上闻所未闻。废纸也比它的纸币值钱啊,金国灭亡的时候很狼狈,在货币史上,也留下了这么个恶名。

在信贷方面,金国原来没有官办的质库,而民间的典当铺又捞钱太狠,利息高达5至7分,或以利为本、放驴打滚的债。后来,比较英明的金世宗看不过去,决定成立官办质库,只取一分利,基本等于公益事业,收来的利息作为给官员的补助。这种官办质库,叫做“流泉务”,最兴盛时,金国各地约有30多所。

金国开国时有一条国家法律,是坚决维护债权人利益的,但相当不人道。该法规定:凡是欠债(无论公私)还不起的,本人或家属要充当奴婢以偿债。因债务而没身为奴,这是非常原始的法律。几十年后,有的地方有所松动,由官府出钱把这些“钱奴”们都赎了出来,放归了家乡。

但是金国的皇帝,也有很怜惜百姓的。

那位金世宗,是金国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孙子,也是有名的“改革家皇帝”。他心肠比较软,上台之后,宋金两国30年没交战。他也下过命令,凡是因受辽国劫掠、或因饥荒而卖妻卖儿的,都由官府出钱赎回。这事情,咱们细想想应该很震撼。

金国是北方强国,把大宋欺负的够呛,我们一般所接受的文化熏陶,都认为金国的形象不大仁慈。但历史就是历史,铁马金戈的金国皇帝,也有爱民的事例。俄罗斯的农民有一句谚语:“一切都会逝去,唯有真理留下。”

金国的一位统治者,就因为做了这么一点点好事,史书上就留下了一个正面印记。

古代的许多坏人之所以不大敢肆无忌惮,怕的就是历史的结论。■

(未完待续)







# 向老祖宗学习： 看中国人如何玩钱

全球金融危机下，一片哀鸿，其实看看  
历史，古人的金融智慧一点也不逊于当今！